

# 上海眾生相 1999

• 毛尖(文) 雍和(圖)

上海的政府網頁第一欄是「上海簡介」，簡介裏說：

上海——東方的大都市，歷經改革開放十八年來的建設發展，已經發生了歷史性的巨大變化，也為上海進一步發展積聚了能量，為上海迎接新世紀，崛起成為國際經濟中心城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面對充滿機遇而又富有挑戰的新世紀，上海已經確定了邁向二十一世紀的長遠發展戰略目標：到2010年，上海基本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浦東新區基本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現代化的新區，崛起成為新的國際經濟中心城市。

從這個政府網頁看，上海的美好未來應該是有目共睹的，而且，網頁上的幾張上海景觀圖——外灘夜景、東方明珠電視塔、大劇院、博物館、體育場——都是氣魄非凡，可以媲美世界上任何一個都市景觀。另外，上海的都會新聞近年來也是一派繁花似錦

狀，包括各種「內衣秀」（雖然更可觀的是那些觀眾的眼神），包括發財以後要把錢給小平同志用的上海新富人，包括那些為流芳千古計而給自己雕像的上海小姐，包括跨國公司做的「老上海」廣告，包括轉個不停的「中國福利彩票」開獎盤。但是，在這樣的良辰美景裏，上海的知識份子卻也在問：二十年改革開放造成的大批「成功人士」，是不是構成了當下上海的市場意識形態的「神話」？生活真的是如電視報刊廣告上所形容的那樣美好嗎？

90年代的上海故事，是從她的懷舊開始的。上海不需要創新，她曾經有過的那段曖昧歷史，足以成為她重新啟航的資本。倫敦當年出過一本書叫《上海》，裏面寫着：「二三十年代，上海成為傳奇都市。環球航行如果沒有到過上海便不能算完。她的名字令人想起神秘、冒險和各種放縱。」而落腳中國的外國人亦都格外喜歡上海，說上海人可親可愛，租界生活安全、自由、愉快，像一個「自治共和國」。而且他們在上海，不像在中國的其他

過去曾是遠東「賭城」的上海，在50年代起已見不到博彩業的絲毫痕迹，前幾年在家內搓麻將也是被禁的。1998年始，「福利彩票」在滬興起，市民踴躍參與，其熱心程度超出主辦當局的預料。



地方常被稱為「洋鬼子」，他們是外國「人」。當時一本外國人寫的《上海概覽》更是把上海描述得如熱帶一般：「快樂，杜松子酒，爵士樂。上海的一切都是無拘束。伴舞女郎——一毛錢到一美元，她們親親熱熱；俄國的，中國的，日本的，朝鮮的，歐亞混血的，有時還有其他的。」上海如此女性，又如此便宜，自然是可親的。

當這一切疊加在一起的時候，就成了德萊塞所謂的「夢中城市」：一個顯示於遲鈍和乖巧，強壯和薄弱，富有和貧窮，聰明和愚昧之間的那些十分鮮明而同時又無限廣泛的對照。正是在這種巨大的落差裏，老上海集合起了無限輝煌和無限陰暗的形容詞，集合起了世上最先進的轎車飛馳過南京路和腳夫背着妓女赴叫局的景象，集合了「這麼這麼的強壯」和「那麼那麼的薄弱」。正是這種都會張力使上海成了「東方巴黎」。

1949年的天翻地覆，使上海成為頭號被改造的對象。從此，上海成了一個無止盡的失血地帶，就像《牡丹亭》裏唱的：「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樣都付與斷井頽垣。」整個三十年，對於上海似乎不堪回首，都市被敗壞了，往昔的風流則成了罪惡的一部分，被驅逐光了。上海成了一個無趣的地方。

但是，也有人願意用另一種眼光看待這個時期的上海。那些住在蘇州河北岸的底層人，突然領受到了革命的陽光，他們搬進了巨大的新村，儘管這新村的建築是清一色的火柴盒子，從審美的眼光來看沒有甚麼趣味，但那些底層人會由衷地唱着，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而且，這個城市的象徵形象由生意人與太太小姐變成了穿着藍色工作服的工人。那個時代的工人，厚道、老實、熱情、忠誠，不像洋場女子那樣可親愛，但給人以安全感與力量。這也許是底層人

對這個城市的貢獻，他們讓上海與農村接近了。但顯然，人們不太願意從這個角度看待上海的變化，人們更願意記住這個時代的上海如何單調、貧乏，如何被管制，如何喪失了活力。

70年代初始，在巨大的革命戰車失去了方向，不知道如何行進下去，而革命對日常生活的威脅暴露無遺的情形下，上海人的眼光由「放眼世界」開始轉向家庭、轉向生活。換言之，工人的形象旁邊，出現了一種市民的形象。其實，在上海的民間，市民化的生活一直保留了下來。而在這個時候，民間的方式進一步公開化了。人們開始熱衷於服飾，開始擺弄相機、盆花。

革命終於完結了以後，上海心漸漸地又熱乎起來。70年代末，上海流行跳舞，年青人在八小時之外，有了過夜生活的念頭。於是，人們可以看到一種特殊的風景：青年男女隨着音樂起舞，舞場中有老人，戴着紅箍箍，或拿着小紅旗，在一對對伴侶之間穿梭往來，提醒着忘情的人們「保持距離」。又有一道風景是西洋墨鏡風靡上海灘頭，青年人為顯示它是西洋貨，不願意撕下貼在鏡片上的商標。華僑商店是上海人非常嚮往的地方，那裏有高檔的、新奇的商品，有外幣的人公開用外幣兌換換券，沒外幣的人私下用人民幣兌換換券，然後擁到華僑商店買令人羨慕的好生活。老工人感歎世事變遷，說這些孩子在單位裏不肯好好幹活，吊兒郎當。但過了幾年，人們可以從外資與合資企業裏看到他們，西裝筆挺，頭髮發亮，勤奮而規矩。這些人的形象，越來越頻

繁地出現在傳媒裏，取代了工人與市民的形象。

如此便到了世紀末，上海越來越大肆地從世紀初搜購衣服、家具、商店、娛樂和夢想，包括愛情的表達方式。從前的怡和、麥迪生洋行又從共產黨那裏租回了他們的「故居」；先施等百貨公司揀起了舊名；上海人從過去的月份牌裏找回這個都市的浪漫歲月，他們像從前那樣，用音節鮮艷、充滿異域氣息的詞彙來重新命名他們的城市：伊勢丹、巴黎春天、舒適堡。而90年代後期層出不窮的酒吧、水吧、咖啡吧、陶吧、畫吧、音樂吧的名字，無一例外地在推銷一種異域風或懷舊熱，像「卡薩布蘭卡」，像「1931」。街上走着的年輕男女，光看頭髮，你已經無法判斷他們是不是自己人；年輕人更用紅衛兵似的熱情去追逐異域或港台的明星。上海瘋狂地思念「老上海」。

弗林 (Caryl Flinn) 在談及懷舊熱潮時曾說：「不論是經典或是當代的故事，總把現在看成充滿缺陷和不足，而過去則表現得相對地完整，具權威性及充滿希望，是一塊『較好』的地方。」所以當代的上海邏輯就是，最好的歲月在20、30年代裏，桃紅人面、錦繡人間在那裏，「卿何薄命」、「儂本痴情」在那裏。換言之，應該在那時生，在那時死。所以，過去的一切因了歷史的光暈成了都是好的，連陰影也因了時間而變得凄美。上海又開始「一邊愛國，一邊買彩票」。今年4月，閔行區天上掉下個飛機，第二天，彩票開獎就在失事現場邊上進行。一邊是肅穆的災難，一邊是興奮的人群，「上海心」中其實有非常冷酷的東西。

但鬼使神差地，上海再冷酷，她依然是人群的方向，依然是目的地，依然是親愛的上海。為甚麼？因為這個都會在各個街口向你作出一個允諾，在每家店鋪前給你一個希望，讓你感到你就住在天堂的隔壁，讓無數只有青春和夢想的人在上海老去、疲憊不堪還是不願離開上海。這就是上海深刻的催眠術。

詩人葉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在〈麗達與天鵝〉(“Leda and the Swan”) 中這樣描寫化身天鵝的宙斯對美女麗達的侵犯：「驚慌，茫然的手指，如何／推開羽翼的光輝，自鬆懈的股間？／置身白蘆葦間，又如何／不感受那悸動的怪異之心？」它似乎恰好地講述了一個上海寓言。上海開埠時，當外國人帶着電、電影、汽車、自來水這些東西進來時，上海在無力的拒斥後都接受了下來，並且熱烈地擁抱了西方文明；相應地，到上海來的外鄉人在抗拒了又抗拒這個城市的「罪惡」後，也繳械了過去的世界觀。

但是，詩人葉芝繼續寫道：「就這麼被銜着，／被上天暴戾的血族駕馭着／在那漠然的巨喙未放鬆之前／她是否汲取了他那與神力並存的智慧？」這裏，天鵝和麗達的關係顯示出了戲劇性的地方：你佔領我的身體，我奪取你的智慧。而世紀末的上海正好顯示出這種和過去、和世界的角逐：在汲取了異域的、過去的經驗後，上海是誰的上海呢？誰感到上海可親可愛呢？上海能否把千萬種風情都化為自己的故事？

然而，世紀末的上海卻顯示了某種力不從心。改革開放雖然也開放了

上海的藝術市場，但是商業原則卻毫無海上風流，藝術市場門可羅雀；不久前的一個「超市藝術展」開幕僅三天就草草收了場；而在外國享了盛名回來的畫家趙無極則被記者和觀眾圍得透不過氣來。蘊藉的海上風似乎帶上了相當的世故和些微老態，叫人想起張愛玲小說〈連環套〉裏的主人公霓喜，在風流了幾十年後，喪失了原先潑辣的生命力和創造力，而蒼白的未來卻「伸出小手，在她的心上摸了一摸」，叫她知道自己老了。不過，她老是老了，她還是要住在上海，她想起鄉村的家還是夢魘。

《聖經》和希臘神話裏都有一個關於「前瞻」和「懷舊」的故事。《聖經》裏講神要剿滅所多瑪和蛾摩拉，但允許義人羅得帶着他的妻女事先逃脫，且和他們約法「不可回頭看」！但是，羅得的妻子終於回頭看了，她因此變成了一根鹽柱。希臘神話裏的故事是說奧菲斯的音樂有感天動地的能力。妻子死了，他的哀樂讓冥王同意他到地獄去接回妻子，條件是他在離開地獄前不能回頭望。但是奧菲斯回了頭，他的妻子因此也消失了。所以，「回頭」即意味着生命的喪失，回頭是悲哀的。也因此，任何的「懷舊」總無法呈現勃勃生機，把過去的歷史變成前進的目標，也許意味着，上海已經無路可走了。

毛 尖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  
研究生

雍 和 上海《新民周刊》攝影記者